

# 铜川作家刘爱玲与云岗谈文学

## 云岗:从渊源上说,我爱看秦腔,秦腔的悲凉、悲愤、悲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,我的作品传承了秦腔的悲剧意识

■ 季风/文字整理 嘉宾/供图

主持人:季风(阳光报《非常对话》编辑)  
对话嘉宾:刘爱玲(铜川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员)、云岗(陕西实力派作家)



### 嘉宾简介

刘爱玲,铜川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员。中国作协会员,铜川市作协副主席,全国自强模范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把天堂带回家》《米家村九号》《杨柳巷纪事》及中短篇小说集《西去玉门镇》等。其中,长篇小说《把天堂带回家》获第三届全国奋发文明进步奖;中短篇小说集《西去玉门镇》获陕西省首届奋进文学奖;中篇小说《上王村的马六》获第三届柳青文学奖及全国梁斌小说奖;短篇小说《落山坪》获第二届延安文学奖。作品数十次获得全国及省、市级奖项,并入选《中国小小说精选》《中国年度精短散文》《陕西文学六十年》《陕西青年文学选》《陕西女作家》等多种选本。迄今已在全国各类文艺期刊上发表出版作品200多万字。

云岗,原名唐云岗。陕西实力派作家。陕西蒲城县人,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艺术家资助计划入选人才,陕西文学研究所重点研究作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城市在远方》《大孔》,中短篇小说集《永远的家事》《罕井》《雪落大地》,散文集《首篇》。《城市在远方》《永恒的秦腔》分别入选《陕西文学六十年(1954-2014)》长篇小说卷和散文卷。曾获梁斌小说奖、柳青文学奖、延安文学奖等奖项。

### 编者按

陕西铜川山川秀美、人杰地灵,有着独特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,地处关中平原北部的铜川是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、书法家柳公权和北宋画家范宽等历史名人的故里。这里还有很多绚丽的民间传奇,

其中就有“孟姜女哭倒长城”的故事;千年炉火不熄的著名的耀州窑,曾吸引贾平凹先生在写作长篇小说《古炉》时来这里长期采风、构思书中人物的地理位置;红色根据地——照金更是闻名于世。在当代文坛

上活跃的和谷、安黎等陕西作家,也是从这片厚土上走出来的,铜川因这些人物而出彩、骄傲。还有在铜川工作的“外来户”——作家云岗在这里长期生活、工作并成长起来,成了陕西文坛的佼佼者。本

期,铜川籍女作家刘爱玲受阳光报《非常对话》栏目委托,对话作家云岗先生。俩人因为很是熟悉、相互了解,谈话因此相得益彰、珠联璧合,也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到铜川文化的深厚底蕴。

刘爱玲:您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实力派作家,迄今已写了几本书了?

云岗:惭愧。上大学时我开始习作,大三时在《陕西日报》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《心之曲》,迄今已在《小说月报·大字版》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《天津文学》《边疆文学》《山东文学》《延安文学》《红豆》《南方文学》《朔方》《延河》等报刊上发表中短篇小说、散文多部(篇)。出版长篇小说《城市在远方》(上、下)《大孔》,中短篇小说集《罕井》《永远的家事》《雪落大地》,散文集《首篇》。《城市在远方》和《永恒的秦腔》分别入选《陕西文学六十年(1954-2014)》长篇小说卷和散文卷;《大孔》入选中国作协2020年度定点深入生活项目;《城市在远方》获梁斌小说奖长篇小说一等奖、第三届柳青文学奖荣誉奖、北方十三省区文艺图书奖;中篇小说《精神容易送神难》获第四届延安文学奖;中篇小说《精准扶贫》获第二届西北文学奖小说佳作奖;散文《回家》获孙犁散文奖三等奖;中短篇小说集《罕井》获铜川市委、市政府精品文艺奖一等奖。2019年被陕西文学研究所授予“有突出贡献的作家”。

可以看出,虽然我在创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,但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还有一定的差距,尚谈不上所谓的“影响力”和“实力派”,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。

刘爱玲:《城市在远方》是您的首部长篇小说,我们也是通过这部小说相识的,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诗意的小说名字,所表现的内容与您的生活体验之间是怎样的关系?

云岗:《城市在远方》开始写的时候,名为《进城》,写着写着,“城市在远方”五个字在我头脑中闪了出来,这本书随即有了正式的名字,也在内涵上获得了升华。《城市在远方》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体验,甚至是生命体验,是对龙民等农村青年群体奋斗成长史的全面书写,也是对我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思考。龙民那一代人人生在连自给自足都无法实现的渭北农村,一条深不可测的沟壑隔断了他们进入城市的道路,他们将和父辈一样在这块土地上生儿育女、生生死死。突然,高考制度恢复了,沟壑上出现了一座狭窄的独木桥,于是“龙民们”的悲欢离合开始了。但书中人物的理想没有一些文学作品中表现得那么高大、那么高尚,他们的奋斗不过是对传统仕途情怀的遗存,说到底是对贫困落后的农村生活的否定,对能过上“商品粮”、找个城里媳妇的城市生活的向往,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精神上的情愫。一些人终于进城了,身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,成了村里人羡慕的那一个,但随之而来的困惑却让他们无所适从,比如失落感,比如自己身上固有的农民意识,比如身在城里,却和农村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再比如被城里人

视为另类,等等。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人的经验写照,如果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未尝不可。这本书写到龙民将有孩子时结束了,很多人说我没有写完,让我继续往下写。但没有这个必要,因为我留下了想象空间,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去不同程度地完成这部作品。作家红孩先生为《城市在远方》获得梁斌小说奖长篇小说一等奖而撰写的评语中写道:

世界上本没有城市,因为人的聚集与长期的驻守,便形成了城,无疑,城市是政府所在地,也是政府发布命令的地方。新中国成立以来,由于国家实行的是“计划经济”,农村与城市形成了城乡差别。如今,虽然中国的很多农村都实现了城镇化,同时也有很多的农民到城里打工,成了城市的新阶层——农民工,但农村人依然找不到与城里人平等的地位。小说《城市在远方》洋洋洒洒50余万字,所演绎的“龙民们”就是一些呼唤由农村人变为城里人的典型代表。由农村人到城里人,不是简单的户口变化,更多的是经济、文化、政治方面的融入,往往要经过两三代人的奋斗。因此,作者提出了“城市在远方”的命题。就是说,一个人可以很快接受一座城市,而一座城市要接受一个人却很漫长。也可以讲,《城市在远方》是新中国城乡差别的一个缩影,也正因为如此,它便具有了史志性。从另一个角度看,中国的城市化建设任重道远,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警惕。

这段话,或许对大家阅读和理解这本小说有所帮助。

刘爱玲:与《城市在远方》相比,读《大孔》我有一个感觉,您的构思非常宏大,人物个性鲜明,有刀刻般的感受,但弱化了故事,请问这样写的用意是什么?人物叙述似乎让人意犹未尽,是否还有续集要写下去?

云岗:《大孔》是《城市在远方》出版十二年后出版的长篇小说,也是我计划中的一部作品。《城市在远方》出版后我就开始考虑这部小说的写作,对小说的人物、结构、情节、细节等元素都进行了认真思考和反复构思,并拟定了人物表和关系图;其间,我发表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也是对《大孔》写作的准备,写作中更是时时刻刻在构思、在激发灵感,应该说准备工作还是比较充分的。小说当初定稿后,西安出版社社长长炳耀先生第一时间进行了阅读,读完后他当即给予了充分肯定,并决定在西安出版社“长安花”丛书中列为第一本推出。读者的反应也算得上热烈,还成立了《大孔》读者交流圈。评论家和作家石杰、任葆华、郭建民、杭盖、崔斌、苏云龙、曹国露等人也撰写了评论文章,发表在《陕西日报》《三秦都市报》《延安文学》《西北信息报》《潇湘晨报》《渭南日报》等报刊上。同时入选了百



第三届柳青文学奖颁奖现场,作家叶广芩为唐云岗(左)颁奖

道好书榜和《中国出版传媒商报》影响力图书。

我想这应该是对我精心准备和辛苦写作的最好回报,让我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厚爱,当然还有您。至于您提到的书中弱化了故事,说实话我有点不同意,一部小说除了好的结构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外,故事情节也是重要因素,我认为《大孔》的故事还是比较吸引人的。当然,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。

《大孔》围绕关中民国十八年闹饥这一线索,采用多重视角的叙述维度,多方挖掘、思考、书写这一段历史特别是渭北民间生活的独特之处,展示了冯得富、冯得显、引才、德才、和才、勤才、俭才、史家怡、蓝玉等众多人物在这一大环境下的所作所为和暖恨情仇,反映了关中农民在自然灾害和历史变革中的态度和选择,可以说是一部有关家族史乃至民族史的作品。小说写到大雨来临时戛然而止,算得上独立成章。但明眼人还是可以看出来,小说并没有写完,因为全书的结构和众多人物绝不仅仅是为了写一个年馑,何况年馑过后,我们的民族和百姓又处在革命、匪患、战争等人为破坏的因素之中,主人公将会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面临什么样的命运,他们的精神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和变化,这便是《大孔》第二部要书写的内容。第一部中的天灾,只是环境,不是目的,正如第二部将要书写的动荡和战乱一样。目前第二部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,只因我的身体状况还没有动笔。

刘爱玲:从《永远的家事》到《罕井》《雪落大地》,再到《大孔》,里边都有写家鄉的影子,使得您对家鄉的情感跃然纸上,长篇小说《大孔》中干脆很多地名都用了实名,能谈谈家鄉与您创作之间的关系吗?

云岗:这一点我同意,原因嘛,主要是我对故乡的人和事特别是生活环境比较熟悉,当然更有我对这片土地的思考和热爱。我出生在蒲城县大孔寨,距离蒲白矿务局驻地——罕井镇只有十公

里,到1982年秋天,我离开家乡到西农大上学,整整在镇里生活了十九年。这十九年是我人生的起点,更是人生的成熟期。在这十九年里,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化,给我的心灵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即便是离开了故乡,我的心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父老乡亲。我常常回老家,而且绝不把自己当成城里人和乡亲们隔开,更不会说官话。我喜欢去田间地头,在这里走走,去那里转转,和乡亲们说话、吃饭,在言谈举止中知道了他们的过去,看到了他们的现在,想到了他们的将来,体会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,了解到了他们的惶惑和无奈。这样,我的写作离不开自己的故乡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从文学的角度讲,我赞同文学是有文学地理的说法,譬如鲁迅笔下的鲁镇,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,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,贾平凹笔下的商州,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……这不单单是一个地理名,而是揭示并赋予了这个区域独特的文化,这些文化由地理、人物、生活、民俗、思想等元素组成,写得多了,便成了一个小说家笔下的“另一个”,也可以称为文学地理,故乡大孔(在别的小说中叫孔庄或孔寨)就是我笔下的文学地理。

《大孔》原名《大孔寨》,陈忠实、贾平凹先生题词时也写的是“大孔寨”。关中国十八年闹饥的故事,我小时候听老人讲过,知道饿死了很多人,具体是怎么回事,老人们说得模糊,我也就记了个大概。我以前也挨过饿,能吃到的基本上是红苕、高粱、玉米等杂粮,和民国十八年闹饥相比不算什么,但滋味也委实不好受。这些年国家提出了粮食战略,这个写作种子便又一次在我心中生根发芽,一天一天地生长起来。因此,我把书中的环境放在这里,书名《大孔寨》就自然而然了,很多地名还用了实名。其中既有唐建民先生等乡贤们的建议,也有我回报故乡的想法,更有以真乱假的意思。但是

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艺术,倾注着作者思想和理想,从这个意义上说,大孔已经不是现实中的一个村庄,而是中国广袤土地的一个缩影,也可以说是文学意义上的“大孔”。

刘爱玲:您的中短篇写作也很出色,屡屡发表在全国一些重要的文学期刊上,比如《饲养室》《八爷的爱情》《精准扶贫》《精神容易送神难》《儒栗》《尴尬》《邂逅》等,既有对过去生活的回望,也有对当下生活的精确把握,更有对职场的深入思考,能谈谈您创作的心路历程吗?

云岗:小说既然有长、中、短之分,一个作家就不能喜欢写什么,或者不喜欢写什么,而应该根据生活的本质和自己的思考决定写长篇、中篇还是短篇。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左拉、海明威、马尔克斯、乔伊斯等人的长篇小说很著名,但他们的中短篇小说也很出类拔萃。莫泊桑、杰克·伦敦、马克·吐温等人的中短篇小说很精彩,而他们的长篇小说也毫不逊色,我国当代的茅盾、王蒙、陈忠实、贾平凹、莫言等作家,也莫不如此。我的写作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,应长则长、应短则短,至于是否出色,只有让读者来评论了。

写作的素材是由作者的生活环境和对生活的思考决定的,我的写作资源在农村和职场,我的作品自然反映的是农村生活和职场生涯。过去的刻在了脑子里,也能达到“以古喻今”的效果,我便写了《饲养室》《永远的家事》《八爷的爱情》《罕井》《一生》等中短篇小说。我们社会正处在历史大变革中,人的思想和情感发生着质的变化,便写了《对对面那个吃梁架上》(原名《精准扶贫》)、《精神容易送神难》《油菜花盛开的村庄》《雪落大地》等中短篇小说。职场生活丰富多彩,既有欢乐又有困惑和迷惘,更能揭示人性,我便写了《儒栗》《本能》《邂逅》《年龄》《人事》等中短篇小说,加上长篇小说《城市在远方》《大孔》以及一系列散文,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我的创作心路?

刘爱玲:当然可以算。您出版的散文集《首篇》,仅听名字就有浓浓的乡土气息。您在小说与散文方面都有出色表现,能谈谈您是如何分配这两种不同文体的创作的吗?或者说,散文在您的创作中占据怎样的位置?您对自己的散文写作有怎样的认识?

云岗:《首篇》发表在《深圳商报》上,出版散文集时用作了书名。散文是表达人的情感和对生活思考的文学形式,短平快且形式多样,当然是我喜欢的文体。但我创作的重点在小说上,因此散文写得并不是很多,至于质量就更不敢“老王卖瓜”了。有人说我把小说创作的边角余料用在了散文写作上,这话有一定的道理,但不全对。

我的很多散文都是在情感积累的情况下经过

认真准备创作的,如《父亲》《父亲在喝水》《老布鞋》《陈忠实——一个无私善良的长者》《一棵杏树》《打麦场》《红苕》等等,和小说的边角余料没有关系。至于题材,这是由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所决定的。

我的根在农村,乡土气息自然就浓了点。至于对散文的看法,我不敢妄言,毕竟我不是理论家,也没有多少体验可谈。如果一定要说,我觉得散文一定要有感而发,且必须是真情实感,必须说自己的话,写作时不要端着架子,要有一颗平常心。我还会写散文,但我会努力写好点,至少超过过去的我。

刘爱玲:有评论家说您的作品有很强的悲剧意识,对此您怎么看?

云岗:这是著名评论家石杰在《云岗小说的悲剧探析》一文中阐述的观点,文章发表在《南都学刊》上。论文的“摘要”中说:“云岗与现实生活之间有很强的亲和力。他既能根植于生养他的那片土地,撷取生活、潜心写作,也有将思想和生活转化为文本的表述能力,对悲剧的叙写便是他忠于生活、思考生活的表征之一。他笔下的悲剧内涵丰富,成因从内到外,不仅有中国传统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美,还有西方传统和现代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美,是作家对生活进行深入思考以及对创作领域进行深度开掘的结果,作品因此更深刻、更富有艺术感染力。”

石杰老师是渤海大学学报的编审,也是一名优秀的评论家和作家,她对文学倾注了巨大的热爱和心血。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,但她一直关注着我的创作,并已经发表了五篇评论文章,既有整体创作的论述,也有对单篇作品的评论,可以说字字珠玑,很有高度。关于我作品的悲剧意识,石杰老师讲得很详细,读者不妨去读一读。我想说的是,悲剧意识决定于作家的情怀和对生活的思考,而不是刻意追求的。从渊源上说,我爱看秦腔,秦腔的悲凉、悲愤、悲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,我的作品应该说传承了秦腔的悲剧意识。

刘爱玲:《大孔》由地方作协参评茅盾文学奖,本身就是对您创作的一种肯定,能说说您接下来的创作计划吗?

云岗:从198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,已经快四十年了。成绩不大,倒把年龄熬大了,身体也出现了一些问题,但我对文学的真诚和挚爱一点没有改变。这段时间我在考虑今后的创作,我想我不能再全面铺开地去写了,应该有选择、有重点地写,因为时间和精力不允许我有更多的想法。除了上面讲过的《大孔》第二部,我力争再写一些中短篇,其他打算写的作品只好往后推了。

只愿老天能多给我点时间和精力。我说过,一个真正的作家是从不满足的,只要活着,就会每时每刻书写着。为此,我将不懈努力。